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视角探析

刘华初

【摘要】对历史问题的分析既需要历史学研究方法，也需要社会视角等不同方法的综合运用，它有助解释李约瑟难题、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变迁等历史问题与现象。通过对特定历史的社会分析，超越常识层面的局限性，分清问题的实质与层次，寻找到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传统历史学缺失社会群体在历史时间中的表现和有关联的前后变迁的相关探究，因而社会动态分析必不可少。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的分析不仅是历史解释所必需，更是对人类未来的“历史预测”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历史问题 历史规律性 李约瑟难题 社会视角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2-0060-08

历史是有关人类社会的历史，对历史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及其历史变迁的运动规律的分析与把握，无论是静态的社会学结构分析，还是社会运动变化的机制探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试图揭示城市发展规律从而开创了美国“新城市史学”流派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塞思托姆曾经说，他已经不再称自己为新城市史学家而为社会史学家，因为“现代城市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联系如此密切，并且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体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对于城市史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①作为现代文明的主要承载者，城市空间是社会性的人群移动，文化社会行为与城市地理物理系统在历史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城市空间不仅是立体型的，而且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超出物理空间之外的多维度生活空间。

一、通过历史的社会分析解析李约瑟难题

众所周知，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针对宋朝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而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历史事实，提出“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产生科学？对于中国古代技术的“发达”，有历史学家拿出一堆理由，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巩固与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条件；经济方面，高度繁荣创造出规模性的社会需求，是科技推动力；文化传统重视教育，为科技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频繁的对外交往，特别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旅”之后的丝绸之路，打通中西古代科技交流发展的通道，如此等等。而对于清末落后于西方列强的科技水平，历史学家也给出了一堆原因：封建制度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抑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政策制约科学技术的传播发展；中国传统技术本身存在缺陷，长期停留在靠个人经验、直观知识上，不能自觉地应用实验手段寻根究底，技术也走不出手工和直观的阶段；再加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

对于上面不同的回答，粗看起来后面所有的要素几乎与前面的一样，这岂不矛盾？再细一看，关于文化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说得过于简单，没有充分揭示出其中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而这可能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外在表现为所谓文明的基本气质和类型，就如一些文化学家对世界不同文明的分门别类。但是，外在表现形态一定有对应的内在结构和机制的区别。而这种对应关系的揭秘却不是外在表现的归类那么容易了。实际上，对这个棘手而又十分重要的典型历史问题的回答需要澄清如下一些问题：为什么同样的要素一方面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科技辉煌，另一方面又导致中国近代社会的科技暗淡。

首先要澄清的是，由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2千余年里先进的东西也会变落后，李约瑟认为中国宋朝科技最为发达^②，但至今也有千年之遥。其次，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参比标准不同，同当时的西方世界或者其他文明世界相比较而言在唐宋等时期是发达的，但是近代呢？特别是清朝后期；或者更简单一些地说，我国古代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吗？没有。事实上，就如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甚至科学革命之前没有现代科学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里难以断言有现在所指称的科学，因为，真正基于理性的科学思维源出于古希腊，并在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革命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众所周知，没有现代科学就不可能有现代技术，因为现代技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这是与传统基于手工经验之上的技术的根本区别。既然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社会里没有基于理性的现代科学的思想基本因素，那么就谈不上基于现代科学的技术，而只能谈论传统的技术，即传统的手工技术和工艺。

就此而言，若没有后来基于电磁学理论、热力学理论等科学而以电力、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微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现代技术断然没有今天的辉煌。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拥有较高的技术，例如坚船利炮，但那种技术与手工技术差异性仍构不成质变的跃迁，也许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通过传统技术的改进而追上，譬如瑞士等国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在钟表等精致的仪器制造方面有很高的技术表现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条件与资源的促进，西方的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系逐渐变得相当深厚，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的过程已经让它们融为一体，以致我们现在难以在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甚至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有科学的影子，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惠更斯、卡文迪许等都能制造光学镜片、摆钟等物理实验器材，只是那时科学理论与实验分工还不那样明显，从而让我们今天能够清楚而明显地看到两者之间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罢了。

单就中国传统社会说技术落后有片面性，明清人口的大量增长无法仅凭土地的扩张和开垦得到解释，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提高，更不必说战国时期、汉朝、唐宋时期的技术成就。明朝的技术创新不断，纺织、造船业的成就即为二例，还有火炮的运用，否则哪来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清朝的手工业、炼铁业单与自己以前相比也还是不错的。只是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之后一种基于科学

的技术出现改变了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而且，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新的生产关系会使生产力的要素得到最佳配置，资本主义革命之后在社会制度等方面为科学技术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因而迅速地拉开了与传统技术之间的距离。

从社会层面来看，不同的社会可能有不同的构成因素，科学是其一，一个社会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科学，但必需技术，譬如火的使用、工具制造，因为这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物质性凝聚剂。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15世纪之后的西方文明并不是单方面有别于传统文明，而是有整体上的不同，不管是新教伦理，“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③，还是鼓励创造发明的商业精神、航海探索，都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类型整体中的核心要素，而且相互影响。由此可见，对社会内部核心要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历史中的问题，毕竟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历史有时间上的重叠，而我们仍在用现代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社会视野来看待中国传统社会，这实属一个时代性历史错位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上面回答提出的理由。其中许多关联松散，因果关系缺乏坚实基础。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劳动生产是人类社会第一需要，它也是科学技术得以产生的源泉。从历史上的因果关系的细节来考察，一种文明体系要产生科学，首先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产生出科学的诸多基本要素，对直观的经验现象进行数学化的描述，这需要克服精英思想中的技术实用主义短视角。古希腊思想与重视逻辑思维的神学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好的思想训练，并有对直观的经验现象进行数学化描述的基本思想要素。因为，科学并不立刻产生可见的回报，它首先只是作为一种雄辩、思想的训练，依附在法律、辩论、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中，属于贵族的历史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就像唐宋的诗词绘画艺术属于上层社会主流的基本生活形式，而不是卖炭翁的生活话语一样。东方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追求直观艺术性的休闲生活，而西方传统精英阶层的休闲生活则包括科学实践活动，在艺术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性，东方艺术多诉诸自然与直观，而西方重理性的艺术表达。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众百姓与上层贵族、精英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的主要制度安排是科举考试，而西方则是宗教与逐渐远离王权威权的政治主导。基督教里包含外在客观化的神学思想，它与科学、逻辑之间的联系要比伦理思想或佛教与科学、逻辑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这大概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思想更有切合性的原因吧。

当然，科学的诞生不是一个单一要素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在思想上的一次巨大飞跃，是思想上整体外化的一个结果。计算机在1940年代诞生时，绝没有显现出它今天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如此重要的苗头，只是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事件累积的结果，而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并不是自始至终遵循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或目标，更不是遵循或受制于首创者的愿望和设想，这与宗教纪律和儒家尊古精神大异其趣。发展的道路一半是遵循，一半是变化，或者更恰当地说，一半是基于原有的价值驱动，一半是在创造出新的价值生发基地，后者并不表现出明确的价值，而且许多在历史发展中最终不过是失败的尝试，其中只有少数成功地成为物质生活或者精神价值转向的新风向标。但是，前面的一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事件得以发生和表现的生存基础，如果没有实用性价值的支撑，数学、科学是不可能出现的。故而，数学依赖于社会生活中实用性的赋税测量和计算，而物理学来自机械、战争的需要，化学来自炼金术，医学在社会中的现实需要则更为明显。高雅的享受可以具有一定的脱离现实实用价值的特征，譬如古希腊贵族阶层的辩论与悲剧，但它最终需要与现实生活关联起来。理论必须回到实践得到检验。

二、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动态分析

作为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涂尔干被普遍认为历史意识淡薄，但马克斯·韦伯、马克思与托克维尔都很关注解释特定时代社会的重要变迁，他们的社会分析具有明显的历史取向。历史学试图以理性的科学精神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科学化运动，从“规律史学”、“事实史学”转向“理解史学”。在新科学技术完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思维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情况下，亨普尔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再次点燃历史规律性描述的的科学性解释与预测的有关争论。^④

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动态分析，但是，这种动态与社会的动态分析不同。历史学虽然诞生很早，但是对历史进行理性的规律性把握的研究还是近代维柯开启的。黑格尔更是对市民社会独有情钟，不过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而系统的考察与论证虽然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但目的却在于论证绝对精神以自由意志的现实化为线索的历史归宿。马克思则在充分吸收黑格尔辩证逻辑与市民社会等精神养分的情况下，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头脚倒置”，从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社会观转变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⑤

虽然也存在帕森斯《社会系统》这样解释社会均衡的理论体系，但历史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因为社会变迁的动态转型而非常紧密，社会学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基础的学科，这可以追溯到西欧资本主义时代，“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的构想与充分利用历史资料。”^⑥对文明历史的研究不能排除对社会动态分析。中国、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中都充满了社会、政治和思想各方面的改革，凡是伟大的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功的改革者，改革无非政治、军事、经济措施、文化等等方面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有的社会体系改革并不很多，从社会结构的平衡来说，那是因为政治制度本身的完善性省略掉了改革的需要，如果没有足够的改革，一个失衡的社会必然出现激烈的变动甚至革命。所以，社会基本层面上的平衡要素决定了社会的稳定性，而非次于基本层面的具体政治机构的调整。

革命时期的任何改良似乎都是难以令人满意，难以抚平激动民心的。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中，尽管甲午战争之后有立宪派运动、各种请愿活动等等，但是，这些运动大多是从上而下的，还没有广泛深入社会各阶层，有些是看到自身统治岌岌可危的状况，为了迎合革命趋势而采取的一种暂时性缓解社会矛盾的举措，即便有些人真心主张改革，那些有限度的让步仍然不能避免被革命的浪潮所席卷的结果。革命既然发生，就不单单是小尺度、短时段、浅层次的动作，它的要求也就不单单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微调，革命性的历史事件一定要在其相对应的层面上才可能理解，而不是基于眼前利益得失算计上的惋惜和遗憾可以告别的。一个社会内部的革命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波及到社会整体，这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部冲突有所不同，后者并不一定波及到国家内部的社会层面。有学者对鸦片战争背后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让人诧异的结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次中国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因为在深层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满清已经明显地不能与英帝国对抗。^⑦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冲击更大的当然是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因为它对于这个社会实体来说是外生变量，无法通过内部机制调整或消化。与文化层面相比较，自然环境的异常表现和外族的强大攻击更为重要，虽然通常来说，自然环境的变迁周期要比文化波动周期更长，但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向来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不可忽视的突变因素。当然，对于传统的王权政治来说，能否足够快捷地自我调节，并应对外来冲击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绝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只是一个军事力量的转化问题，而涉及军事、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层次之间的关系。跨层次的力量转化问题并不等同于一个层次内的局部问题，这一点是古代王朝没有认识到而最终灭亡的一个原因。

社会的变迁是流变的而不是静止的，用静态社会的结构要素说明动态的历史是一种前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气候变化对草原部落生存空间的压缩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南方开发是否具有足够的生产力技术条件，如铁犁牛耕的改良从而实现水系农田的深耕，灌溉技术的运用和管理，等等。而相对发达的文明政权如宋（相对于金），金（相对于蒙古），还没有将发达的生产力文明要素转化到小尺度的政治层面上来，从而避免与北方的冲突。

发达的文明实体在军事上并不一定虚弱，但是在某些波动过程中，层级间力量的渗透和各自不同的运动规律可能引发混乱局势，这会给其中的反序力量提供了显现空间，可能一直隐而不发的内因将会得到激发机会。这个机会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由于它自己缺乏突破技术瓶颈的能力。其二、对于整个社会说，它是一个积极的力量，是对社会发展不同路径进行选择的机制。站在微观层上看，人们总是会想象地把整个社会某种时代性悲剧归结到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个利益集团的身上；但跳出来在宏观层上有了开阔的视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也就不同，纠缠在个人命运上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更为根本的还是个人或者集团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以及历史时代为何会产生两种不同而相互对抗的路线。马克思唯物史观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要素来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是抓住了社会的最宏大要素，就是试图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三、面向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整体分析

就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来说，虽然在古代就有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文化传播，但严格意义上的全球通史或者世界史是从近代（16世纪甚至晚至19世纪）才开始的。这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题——现代性问题，即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虽然从欧洲开始，但呈现出向全球扩散的发展趋势。根据吉登斯的眼光，三大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马克思与涂尔干分别从理性、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等三个重要的方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原创性的解释，从而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本范式：解释主义、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

马克思认为，随着人们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民族之间的封闭状态和分工便被打破，“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⑧毫无疑问，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⑨所以，研究和谈论中国的近现代史、近现代史，越来越需要在世界近现代史的范围内谈论才更有面向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⑩全球化基本的原则与理念、动力与交往、历程和过程都是由世界现

代化的基调所基本确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与社会特殊性、包括近现代屈辱历史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和运动，都可以在更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中获得理解，接受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内在联系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正是因此，一些现代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体系及其历史变迁时，都反对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学术分科，而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①

社会是一个分层次的整体，马克思与韦伯的理论是绝大多数有关阶级和分层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是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决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决定生活资料的生产。而韦伯也认同社会是以围绕权力斗争与财富分配而展开的活动，但其中不只是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还有社会地位与党派政治的参与。

从社会变革的上层着手，即在缺乏大众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指望通过简单移植西方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观念就可以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结果必然是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社会底层力量缺乏变动，社会生活方式没有变化，想要从传统的无政治生活形式转向具有普遍的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活即便是一种善良的“顶层设计”，在面对传统生活模式的回归压力时也不能得到持久维系。有些时候，在人民高度的拥护与信任下，可能动员社会大众，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状况还离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而全面的发展很远，那么离开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②换言之，还不是现代型的，没有经过现代生活方式与思想的洗礼，那么就不能说是一种能够参与交互建构的能动性力量。正是由于社会基本形态对于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与中国近现代史最有相似性的很可能是俄罗斯、日本和印度，西方是社会和经济基础先行从而推动政治变革的，而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则不同，这一点马克思早已给我们指出。看看俄国的现代化阶段，废除农奴制的成功绝不只是靠沙皇一道简单的政治法令。而中国清朝末期社会规模巨大，人口众多，而土地经济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国门打开之后，随着国际贸易、铁路轮船矿业等各种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但这仅限于东南沿海少数地区，而整个社会急切需要各个层面新的转型。

在历史中的西方世界里，法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具有高度相似性，至少比中国与英国或者美国更有可比性，原因就在于它们社会基本结构的相似性。中国古代的上层建筑并没有成为社会的障碍，而马克思所直面的西方世界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社会基本结构都已经发生了转变，如大量的科学家、技术发明、经济发展，它们导致上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了过时的制度枷锁，尽管如此，发生在法国的最激烈的西方政治革命仍然经过了几个来回过程才稳定下来。法国大革命绝不可能在 1789 年实现“一夜之间三个等级制度土崩瓦解”，因为在此之前，在启蒙思想运动中有一系列的人物、著作和思潮传播。不过同时，在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上，由于传统的等级制度力量太过强大（至少与英国相比是如此），这种先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逐渐渗透社会意识，最终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生了革命。然而，由于社会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产力的基本社会形式）还没有根本上消解传统的政治力量，所以发生了后来的拿破仑三世的复辟等来回反复，但是，文艺复兴之后宏大而深刻的启蒙运动与工业化所确定的社会发展最终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与历史上革命家的意愿相反，革命并不能替代社会改造、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甚至并不能够显著地缩短这个过程。法国近代史与英国近代史走的不同道路表明了这一点，断头台的确不能够真正消灭阻拦历史车轮的保皇力量，工业革命及其导致的社会变型运动更有效得多。如果一个

社会基层并没有发生变迁，那么任何上层的变动最终将化为乌有。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决不是辛亥革命的几声枪响就可以翻过新的一页的，满清自海禁大开以来虽然已经引进了不少西法，但这些西法到了中国都“迁地弗良，若亡若存”，原因似乎如严复所说，“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制约社会变迁的是急功近利的思想。^⑬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特别是不能把本来应该有社会精英阶层与统治阶级承担的历史责任归咎到人民大众头上，但是，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却也是当时的真实状况，这的确还需要巨大的教育投入。鲁迅对辛亥革命没有触动中国社会基础的刻画表现在《药》和《阿Q正传》里，“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从前的老把总。”^⑭虽然这是小说，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尤其底层）的基本状况：社会基本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实质变化，遑论大众思想，中国清末的许多运动都是从上往下的。这和法国革命第三等级等各个不同阶层在革命中的表现很不相同。甲午战败之后，有识之士深感义和团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悲剧，纷纷提倡“开民智”，它也变成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口头禅。于是，一系列在今天的事后“诸葛亮”看来太激进的启蒙运动便开始了，白话教育、文化运动甚至废除文字的思想。然而，从上到下的社会层次之间的思想、政治和社会交流互动十分缓慢，因为中国庞大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层绅士大多仍是旧的礼制思想，广大农村因为交通、通信、知识和思想的传播缓慢，社会财力的贫乏等转向现代社会的速度极大地受制于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的现实水平。

每个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冲突。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里主要根据世界市场——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定义全球化的分析层次，从而扁平化了三个层次——阶级关系、国家行为、世界体系，试图把三者都压缩在世界体系的动力模式中来获得最终解决，显然，经济政权与政治、军事外交、乃至文化思想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政治、军事外交等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与国家经济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国家来说，即使高超的意识和文化也必须以社会自身的存在为前提。遗憾的是，古希腊群星灿烂的智慧大师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过度追求自我的精神和思想的小天地，而遗忘了自己身边的其他社会群体的存在与诉求，他们时时刻刻都可能与自己发生冲突，毁灭自己。他们没有将国家的命运置放在整个人类的社会之中，至少没有寻找到如何在世界中生存下来的现实方法。就像尼采所说，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⑮。古希腊过度地追求小圈子内的民主生活、民主的形式，让高昂的运作成本最终导致这个民族的毁灭。

如果说从社会变迁中能够探寻历史规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它的任何行动都必须要保持自身的利益协调，而不能超越这个基本层面。即使在文明程度上看起来落后的部落，也是在基本的求生本能支配下对发达的文明进行顽强的抵抗或者少有成效的进攻，布洛赫对一种相当落后的文明最终抵抗失败而缓慢地转向一种新的信仰的内部原因进行了探究，并指出，“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相应的团体来对抗基督教民族组成的强大教士团体。各血缘群体或民族群体的首领是仅有的祭司。……对于首领来说，与迁徙运动和国家形成相联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他们作为祭司的威望也许是个沉重打击。……多神崇拜本身也使他们容易接受新的宗教，不管新的宗教来自何方。”^⑯总之，对历史规律的探寻绕不过社会理论，绕不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或对抗。

-
- ① Bruce M. Stave, *The Making of Urba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through oral history* (《城市史的形成》), Sage Publications, 1977, p. 221.
- ② 李约瑟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 ③ 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年, 第 121 页。
- ④ 张文杰编: 《历史的话语: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318 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32 页。
- ⑥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45.
- ⑦ 茅海建著: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年, 第 557 页。
- 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88、277、86 页。
- ⑪ 沃勒斯坦: 《世界体系》, 庞卓恒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 11 页。
-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89 页。
- ⑬ 李孝悌著: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8 年, 第 14 页。
- ⑭ 鲁迅著: 《阿 Q 正传》(赵延年木刻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95 页。
- ⑮ 尼采著: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陈涛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序言。
- ⑯ 布洛赫著: 《封建社会》(上), 张绪山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第 91 页。
- 作者简介: 刘华初,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海口 571158
- [责任编辑 刘慧玲]

ABSTRACTS

(1) New Normal Necessitates New Supply, New Supply Relies on Innovation: What I Gain From Studying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ume 2

Wang Jun·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defines the new stage that China's economy enters as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tudying the related discussion i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ume 2, we will better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such as how to perceive the New Normal and how to work in the New Normal. What I gain from the study is that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gradational change rather than a periodical phenomenon. In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development remains the first priority, and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Being faced with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vital to dealing with the deep-roo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economy and strengthening adaptiv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s essential to realizing the leading-sty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2) Evalu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4

Sun Jian, Ding Xuemeng·20·

This paper uses DEA-Tobit two-stage method to analyze the three efficiency val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development of 30 provinces from 2005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is the most ideal. Also, there is still an imbalance within each region. The quality of workers,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structure have a direct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nominal GDP and nominal GDP of per capita have indirect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development through two intermediary variables: government input R&D ratio of the region and workers' quality.

(3) Method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Issues: An Inquiry of Social Analysis

Liu Huachu·60·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problems requires application of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because it is helpful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important issues of history, such as the Needham Puzzle and the phenomenon of dynasty replacement in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Through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issues, we are able to reveal the limitations of some basic knowledge that remain at the layer

of people's common sense, distinguish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and find the basic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History fails to illu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groups in historical time and the related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a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Therefore, social dynamic analysis is necessar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s the basic trend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human society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the basic position of "historical prediction" for the future of mankind.

(4) A Preliminary Study of Official Assistants Selection System in Taiwan in Early Qing Dynasty

Li Xizhu· 87·

After Emperor Kangxi's campaign for unification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boundary official salary system was implemented, and Taiwan officials at various government levels should serve for three years according to rules. The official assistants selection system was implemented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1729). After Taiwan Taotai, Prefect, Tongzhi, Assistan Sub-prefect, County Magistrate served for a year, other staff would be sent to assist them for six months. The term was adjusted to two years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The term of the office of Taiwan officials was recovered to the initial term of 3 years in Kangxi period, and the system was finally canceled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43). Taiwan Official Assistants Selection System was not only a flexible solution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aking account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aiwan officials but also a small experiment and an episode of Taiwan's official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It suggests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s emphasis on Taiwan and its prudence in changing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aiwan. Also, it suggests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governance of Taiwan. In Kang-Yong-Qian Period, the government paid so much attention to Taiwan and tried many ways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Taiwan. Thus, the view of "passive governance of Taiw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fact.

(5)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Cro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change Among China, Europe and Japan in the Modern Era

Zou Zhenhuan· 117·

The use of the terms of "Red Cross" and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terms themselves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of scholars. This article centers on how the terms such as "Red Cross" (1883),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1894), and the other related term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us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 phenomen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ncepts or terms in China, Europe and Japan in the modern era is discussed. Besides discussing the terms such as "Red Cross"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resent article involves Sun Yat-sen's *Ambulance Lecture: First Aid to the Injured* and its second edition into the scope of study,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Sun Yat-sen used the term "Red Cross Society" which did not exist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book as the title of the translation.

(6) Ritual Music and Poetry of Traditional Politics: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ly Unearthed Carved-Stone Pictures of Han Dynasty

Liu Ke· 136·

Paintings and pictures of Han dynasty refer to those paintings and pictures that were carved on